

隋唐时期旅日华侨探究

岳程楠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隋唐两代是古代中日交往的新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隋唐时期中日两国的交往一般是以外交访问和宗教活动为主。侨日高僧是隋唐两代旅日华侨的一大主流,也是古代旅日华侨的一种独特形态,对日本历史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影响。这一时期,侨日华侨在促进唐日文化交流和日本社会发展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关键词] 隋唐时期 华侨 特点 影响

[中图分类号] D634.3.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 (2009) 04-0029-03

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最早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二十八年记载:“遣徐福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徐福东渡的传说是中国人移住日本的最早记录^[1]。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再一次出现东渡日本的浪潮,日本古史中有所谓“秦人”、“汉人”的记载,就是指这一时期的中国移民集团。

隋唐以前的中国人大多是以集团移民的方式移居日本的,隋唐以后是以僧侣、外交人员和商人为主,前往日本弘扬佛法、外交访问和进行贸易。此外,还有一些士人和技艺人员,他们都为日本社会和中日友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隋唐时期旅日华侨的特点

隋、唐时期(581~907 年),中日两国友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人前往或旅居日本的形式有新的特点:

(一) 东渡僧侣占多数

隋唐时期,旅日华侨中高僧占了多数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色,也是古代旅日华侨的一种独特形态。日本奈良朝(710~794 年)以后,东渡日本的汉人以高僧、士人、工匠和商人为主,他们不同于以往集团移住的中国移民,而是具有侨寓的性质,成为古代日本华侨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旅日僧侣在这一时期更占有相当的数量。这些来自中国的旅日侨僧都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宗教修养,对于日本佛教的创建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事迹较显著而有姓名记载于中国和日本史籍的莫过于高僧鉴真大师,他从唐天宝二年最初的渡海计划开始,前后 11 年,历经五次失败,备尝苦难艰辛,终于在第六次成功赴日。在日本,鉴真大师不仅弘扬佛法,同时也传播中华文化,对中日间的友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个人赴日者较多

隋唐时期赴日华侨以个人或少数人同行的比

[收稿日期] 2009-07-13; **[修回日期]** 2009-11-29

[作者简介] 岳程楠(1985-),女,河南开封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2007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现当代海外华人。

较多。而且这个时期的赴日唐人已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出身于集团首领或王侯将相,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弓月君、阿智王、安贵公等,而是多依靠自己的才能。隋唐时期远涉沧波,东游兴化的唐人艺员和士人也很多,也有接受日本遣唐使的盛情邀请而赴日的,他们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像鉴真、袁晋卿等在内的唐人赴日以及他们在日本历史上的贡献,就是日本遣唐使“虚往盈归”的一个组成部分。

隋唐一代,旅居日本的华侨除了上述的集中情况外,还有一些赴日进行贸易的唐商也不容忽视。在进行国际贸易中由于业务的需要,一些唐商居留当地,成为旅日华侨的一部分,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在日本华侨发展史上,这一时期之所以由过去以秦人汉人集团移住形式为主发展为以僧侣东渡形式或少数人赴日为主,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

第一,日本奈良时代以君主为中心的国家权利逐渐形成,通过大化革新运动,确立了律令体制,特别是先前长达200多年时间里的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在各个领域开展了唐化活动,使日本各方面都大量摄取和吸收大唐文化,并把这种大唐文化又较好的融入到日本民族文化之中,进而产生了平安时代充满民族风格的“国风文化”。这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已经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大量吸纳日本列岛以外的“渡来人”。

第二,盛唐时期中国国内十分稳定和兴盛,中日交通南路航线的开辟,航海技术的发展,事实上也使移民集团东渡失去了社会基础和需要。

第三,日本奈良时期(710~794年),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以佛教为主的唯心主义思想。当时,佛教在日本地位上升,并受到以天皇为首统治阶级的崇信,转变为与律令国家表里相连的国家佛教。隋唐以后,中国佛教已基本上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受中国佛教的影响,日本佛教的法相宗、三论宗、华严宗等都来源于中国佛教^[2]。通过长期不断的遣唐学问僧、请益僧的留学求法,并经他们又招聘一大批唐僧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于是旅

日高僧便成为这时期旅日华侨的一大特色。

二、隋唐时期旅日华侨的作用

隋唐两代是古代中日交往历史的新时期,也是日本学习、吸收中国文化的高峰期。过去谈及唐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往往忽视了居留日本的华侨的作用。其实他们也是推进古代日本历史发展的功臣。隋唐时期赴日华侨的阶层更加广泛,人数也大大增加,僧侣、商人、工匠、文人义士等,都在各自的工作和活动中为日本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积极参与日本大化革新运动

日本大化革新萌芽和推行之初,其指导思想和改革模式大都是在“汉族归化人”^①后裔参谋策划下确立和完善的,最著名的如“汉族归化人”后裔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僧旻等。他们曾留学中国二三十年,身历隋唐两代^[3],回国后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大化革新前夕,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手把黄卷,自学周礼之教于南渊先生所”^[4],并与他们就改革国家制度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大化新政权建立后,僧旻、高向玄理被任命为国博士,成为日本政府的最高顾问^[5]。新政权的典章制度都是参照隋唐的《武德令》、《贞观令》等律令,揉和日本本国固有的习惯法而制定,为日本皇室政权建立律令国家体制奠定基础,其中华侨的贡献是巨大的。

(二) 东传佛教弘扬佛法

入日唐僧、唐商,以及“汉族归化人”后裔对佛法、文史等方面在日本的传播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日本佛教的创建和发展,除了遣唐学问僧之外,还有赖于一批批东渡日本的中国高僧。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宗教修养,这些高僧不怕波涛险恶,远涉大洋,来到日本弘扬佛法,为日本“护寺镇国平安朝圣”的国家佛教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日本佛教的各宗派许多都是经旅日僧人从中国直接传入而确立的。

日本奈良时代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六宗,其中

①对于古代入日的外国人,最早用文字记载的日本史籍如《古事记》、《日本书纪》等中,称之为“汉人”、“新汉人”、“吴人”、“唐人等”,今人常称“归化人”、“渡来人”、“和”、“华侨”、“华人”。《古事记》常用“度来”,而《日本书纪》多用“来归”、“归化”。《续日本纪》用语均为“归化”,明显是当时律令和正史的用语,反映了日本朝廷的政治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史学家才改用“渡来人”以代替“归化人”这一称谓),因为从中原地区经朝鲜移住日本的中国人,大多自称是秦汉帝家苗裔,按其入日时间先后或以其自称汉帝之后而被称之为“秦人”或“汉人”魏晋以后入日者被称为“新汉人”。

影响最大的律宗和华严宗便分别由唐高僧鉴真和道璿东渡日本,直接亲传。特别是鉴真传播的律宗,深受日本皇室的尊崇,圣武天皇还亲自在东大寺卢舍那殿前设戒坛,后来又赏赐田地,建设寺院,使律宗在日本的到广泛传播。

唐朝高僧东渡日本的时候,往往会带去大量的佛经典、佛像和佛具。从物质和文化上同时对日本佛教各宗派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 促进日本科技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隋唐时期中日交流的范围十分广泛,唐代的科技、建筑、医学、工艺、绘画等各个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不少影响。在这一时期的旅日唐商、工匠以及其他中国移民都起到了推动日本社会进步的作用。根据史书记载,中国的指南车和飞舟等便是在这一时期经由唐人传入日本的,《日本书纪》天智五年(666年)条载:“倭汉沙门知由献指南车。”《续日本书纪》又载,养老七年(722年)“唐人王元仲始选飞舟进之,天皇嘉叹,授从五位下”^[6]。这里所说的“倭汉沙门”和“唐人”无疑为入日汉人或其子孙,后者可能是当时的华侨。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日本史籍中,一般称融入日本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为“归化汉族人”,而新到的中国人则直接称之为“汉人”、“唐人”。

在建筑及技艺方面,唐朝旅日僧侣、商人、工匠等的贡献尤为突出,特别是在寺庙建造方面更加显著。日本古代的寺庙建造,无论布局、风格、雕塑、绘画等大都受唐代的影响。鉴真大师在日本国内弘法时期,于公元759年亲自指导设计建造的唐招提寺,就是按照唐朝的寺院布局和建筑模式建造的,这座宏伟的建筑物是奈良时代的代表性建筑,至今仍屹立于奈良古城。除了佛寺建筑物外,日本宫殿庭园的建造也大都模仿唐长安京都的样式,在这方面,“汉族归化人”及其后裔所做的贡献最大。朱云影在其《中国工业技术对于日韩越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当时土木工程的营造,多依赖华侨的功劳,如圣武天皇天平十四年(742年)八月,造宫录正八位下秦下岛麻吕,以私资营大宫垣之功,超擢从四位下……同年正七位上大秦宅寺,亦以营太政官院垣有功,授从五位下。”^[7]这里所说的秦氏,就是华人或华裔,从他们所受的提升和叙位来看,说明他们的功劳是很大的。

日本的汉医学早先大都是经朝鲜半岛传入,到飞鸟时代(593~710年)则主要直接从中国传入,

“汉族归化人”及其后裔,旅日的唐僧、唐商和华侨在这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奈良时代,佛教盛行,赴日唐僧中有很多是精通医术的,如鉴真对本草学有独到的心得,虽然赴日时已双目失明,但却能用嗅觉辨别药物的真伪,并且在日本期间创制出很多方剂良药。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一书久著录有《鉴真上人秘方》一卷;《续日本纪》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763年)五月条,记录有鉴真为后光明皇后治病开处方,并颇有效验一事。直到今天,鉴真仍旧受到日本人民和医学界的普遍敬仰。

在工艺刺绣、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日本也深受中国风格的影响。由于奈良、平安两朝佛教盛行,佛教艺术也得以繁荣发展。当时日本大力仿效唐朝,大量寺院的壁画图绘,佛像雕塑,都出自赴日唐僧之手。音乐方面,唐代的正统音乐雅乐传入日本后,日本朝廷和佛寺每有庆典便演奏。

在信息传播受到限制的古代社会,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依靠文化创造者本身作为媒介来完成的。古代赴日的中国移民就是把中国先进文化传播到日本列岛的主要媒介。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到隋唐两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赴日的唐人与过去相比有所不同,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宗教修养的僧人是古代旅日华侨的一种独特形态,对日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影响。这一时期,无论是侨日的僧人、士人、商人等所有的侨日华人在促进唐日文化交流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罗晃潮.徐福东渡的传说与日本最早的中国移民[J].华侨华人研究·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
- [2]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M].人民出版社,1973:17.
- [3]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商务印书馆,1980:57.
- [4]陈昌福.日本华侨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20.
- [5](日)北山茂夫.日本历史讲座(第一卷 原始-古代)[M].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26-128.
- [6]罗晃潮.日本华侨史[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54.
- [7]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508.